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五四期 ——
(二〇〇七年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2b)

【回首文革】聂元梓文革回忆（节选二）

聂元梓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聂元梓文革回忆（节选二）

• 聂元梓 •

◇ 回首往事，几个严重错误

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凭自己的有限理解去领导北大的运动的时候，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犯了各种错误，这是我今天回想起来非常痛心的。

我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是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和到上海去搞串联，参与了对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荻秋（上海串连一事，详情见下一章）。还有，我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此外，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的行动，我也应当承担应负的责任。

1966年11月8日，我在一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上领头签了名，表示同意打倒邓小平。据说，这是全国第一张公开张贴的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别人写的，我签了名，而且是排在第一个。这是在中央提出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当时以为，这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啊。据说，毛主席说，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还没有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呢。根据这个精神，北大有几位学生和老师就写了这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如下：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权问题是革命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权我们就有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要使我们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

我们认为，我们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56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中，就公开推销赫鲁晓夫集团的黑货，大肆吹捧苏共二十大，大反所谓个人崇拜，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的重大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产生了影响。在谈到关于领袖对党的作用时，非但不谈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却大喊反所谓“对个人的神化”，说什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最后则赤裸裸地反对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说什么“个人崇拜是长远的历史的社会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定的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一九六二年，当我国由于苏修的破坏和天灾的袭击，使经济发生暂时的困难，邓小平便带头大刮资本主义黑风，他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搞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一九六四年，我国文化领域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由于周扬之流从中破坏，运动搞得很不彻底，可是就是这样，也大大激怒了邓小平，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革命派对资产阶级老爷的讨伐，公开反对文化革命。据黑帮分子万里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透露，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打仗的，兵演兵。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了。”邓小平自己诬蔑革命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住个小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邓还说什么“学术观点、教学观点不改不要紧，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

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有甚者是破坏四清运动，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扼杀是一个典型事例。

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已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何止一个彭真，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就是彭真的后台之一邓小平。

一九六五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在彭真的亲自指挥下，前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实。陆平、彭佩云在会上对北大社教运动疯狂反扑。陆平的反革命言论传到北大后，遭到革命派的愤怒反击，正在陆平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绝境时，这时，一方面彭真出场，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下令停止争论，即所谓“泻两肚子气”，另一方面邓小平则说他“欣赏彭佩云的发言”，夸奖陆平的反革命言论“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继之，就由邓小平招集了所谓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一面自称

他看了北大社教的全部简报，但同时却颠倒黑白地为北大社教运动捏造了三条罪名，一曰：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一开始就以烂掉单位对待，搞了夺权斗争；二曰，没有实行“三结合”（即不与陆平黑帮同流合污）；三曰：在斗争方法上有了严重毛病，（即所谓对陆平黑帮搞了过火斗争）。为了嘉奖陆平彭佩云的反革命“功绩”，会上决定让这两个家伙参加工作队八人领导小组，同时还委托万里这个黑帮分子召开反革命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万里在会上动辄就是总书记如何如何说的，以此来给革命派施加压力。

在三月三日所谓书记处的会议上，邓小平还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中明文规定：“逐步做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但邓小平却擅自决定机关、厂矿、学校的工作队要一进门就与干部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结合起来）。这不仅把“逐步”改成“立刻”，而且实际上“三结合”也改成了“二结合”。像陆平之流的黑帮分子，如果工作队一开始就三结合，试想群众又如何发动得起来？结合起来，除了搞反革命还会搞出别的名堂来吗？可见，邓小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国际饭店的反革命会议召开了，陆平被打散了的反革命阶级队伍也算重新拼凑起来了，但工作队的领导权还在革命派手里。因此，要彻底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取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会议，撤了队长张磐石同志，还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又与刘少奇一起，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罪上加罪，罪莫大焉。

邓小平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革命是铁证如山的，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参与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已破产，但是我们必须痛打落水狗，把他的反动面目予以充分揭露，彻底清算他的罪行，使他永远不得翻身。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大学：

聂元梓 白晨曦 孙蓬一 李清昆

夏剑豸 宋一秀 陈保义 李玉英

杨文娴 徐云影

1966年11月8日

将邓小平认作党内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大走资派，一目了然，我们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上到处都在说，要打倒邓小平，北大聂元梓都出来了，这对社会上反对邓小平的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都是我的严重错误。

还有，康生指示要揪叛徒，我们也执行了，成立了揪叛徒战斗队，搞了一些活动。不过，关于“六十一人叛徒案”，我是坚持不去搞的，因为我知道这都是历史，是党中央已经做过组织

结论的；在延安整风和“审干”的时候，都已经讲清楚了。彭真、薄一波那些人有问题，你抓他的现行活动好了，历史问题再查也没有意思。我还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他们走资派，就给他们的历史随意地定什么叛徒的罪名。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林学院的胡某某，还有他的爱人，战斗队认为他们两人是叛徒，我们也没有给他们做结论，没有定性说他们是叛徒。这是我参加的。对于薄一波，当时有红卫兵说他组织牺盟会是与阎锡山勾结什么的，这件事我顶回去了。我当年就在牺盟会工作过，我知道这件事。我说，牺盟会没有问题。我也是阎锡山组织的同志会的会员，我们参加同志会都是党批准的。所以，后来对立面的“井冈山”反我的时候，其罪状之一，就指责我曾经是薄一波手下的。

还有彭真，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时候，毛主席表扬过彭真，说是晋察冀的工作做得好，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在延安的时候，开七大，毛主席表扬过他。这些情况，青年学生们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对学生说，彭真有什么问题可以查，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轻易地抹煞他的历史。这些话，那些参加揪叛徒战斗队的学生应该还记得。

我们校文革领导的揪叛徒活动，时间并不长，参加人员非常有限，“成绩”很少，很快就解散了。后来的“第二战斗队”，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的揪叛徒行动，我无法负责。

我的错误，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反对朱德的。

当时是听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宣传，说是刘白羽写的《朱德传》有不符合事实的问题，是一本坏书。当时我同意批判《朱德传》中的问题。我以为这是要批判刘白羽的，就同意由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和新北大联合批判该书。但刘白羽写的怎样不符合实际，当时会议没有多讨论，然后我就离开校内工作一段时间。批判《朱德传》的事情，就由在校的人主持。

接下来，我正在校外开会，正在参加筹备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时候，发现新北大校刊登出了“朱德是大野心家”的文章。当初讨论批判《朱德传》的时候，并没有说要进一步地把火烧到朱德身上。批判朱德，这显然是严重地错误的。当时我即刻打电话给校文革，要求他们马上收回校刊，检讨错误。我毕竟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干部，对于朱德总司令，我有自己的判断啊。校刊就这样收回了一些；已经发出去的，无论如何，都收不回来了，你向谁去收啊？我所能做的，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可是，后来把北大反对朱德的罪名，还是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根本地违背了事实。我只能承认，参与批判刘白羽和批判《朱德传》是我的错误。

后来开“九大”的时候，开了一个小会，批判朱德，我就没有发言。朱毛朱毛，没有朱就没有毛。对于历史，我是非常尊重的。就是朱德有什么错误，这是党内的问题，用不着这么批判。到这时候，全党都批判完了，就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这使我感到不对头。

我那时候已经提出了和中央文革相对立的口号，反左不反右，但是，我没有勇气讲别的，没有勇气再进一步。“九大”就是搞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这还不够，还要搞朱德。我当时对毛主席也没有更多的认识，就是觉得，党内老同志都批判完了，贺龙、彭德怀他们这样地挨整，毛主席应该去看一看，看一眼也好，都是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不该这么无情地打击。错误归错误，人情和友谊还应该讲吧。我认为毛主席太独了。还有，对刘少奇，戴了一堆帽子，当年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一说有问题，就都呼拉呼拉地揭发出来了？江青曾经对我讲过许多关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转述过，即使是在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以后，我也没有重复过江青“揭露”刘少奇的任何内容。

◇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情况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她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换个例子说，陆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对陆平的孩子搞过什么鬼名堂？没有啊。陆平是陆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邓朴方我也没有讲过要整他。当年那种条件下，我在校文革负责，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都会记在我的账上。给邓朴方治疗的事，我没有插手，当时那种思潮影响下医生护士对他的态度，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换了一种情况，也许会治疗好一些，但是，这都不是我搞的。

◇ 兼答季羨林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

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羨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羨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羨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羨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羨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羨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羨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羨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羨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羨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羨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

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羨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羨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季羨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第十二章 上海串连真相

◇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我这个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正在困惑之中，李讷到北大来了。

1966年11月12日上午，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到学校来找我，我正好不在。校文革的办公人员告诉我，上午李讷找我没有找到，由校文革办公室通知我，约好当天下午2时许，李讷来校文革找我。我和孙蓬一商量了一下，在校内五院校文革组织组的一个带套间的办公室和李讷谈话——这里谈话比较方便。于是，下午我就先在办公室等着李讷。

李讷在校文革找到我，在办公室谈了几句话，我就领着李讷到五院组织组去。因为上午李讷来过，没有找到我，所以使许多人都知道李讷下午还要来。校文革的有些人都希望能一起见见李讷，听听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因此，李讷来后，先同大家（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付治文等人）先在组织组的外间屋一块儿谈，随后李讷辞退了他们。我提出可否大家一块儿谈？李讷说要同我自己单独谈。随后我陪同她到里间办公室。李讷对我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就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所以，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什么？想些什么？”

我请李讷代我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且请李讷向毛主席转达我对毛主席的请示。我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请示应该如何处理当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说了运动下一步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说，我现在是在抓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建设，别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请示了存在的问题：对被群众冲击还在集中管理劳动的校系一批干部、教员、教授和陆平等怎么办？我对李讷说的另一件事情是，全校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连了，学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连去。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李讷没有表示什么，她说回去向主席汇报。

为什么向毛主席请示关于陆平等人的处理问题呢？说实在的，这对我是一个大难题。工作组把陆平等关起来，现在工作组人也走了，陆平他们应该怎么办？把陆平关起来不是我决定的。陆平是工作组关起来的，他们撤走的时候，也没有移交给校文革。看管陆平的学生，一定要让校文革接收陆平，我就不接收，始终不接收，始终没有过问。我不知道把陆平接收过来以后怎么处理他。因此，看管陆平的学生，一直是工作组当时安排的那些人。为什么不接收？我认为把陆平关起来就是错误的，关他干什么？如果是因为有很多学生要批斗他，怕出问题，保护性关押还可以，可是，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了。陆平现在还在关着，工作组已经走了，陆平是不是还要关下去？但是，直接下令把陆平等人释放出来，也不合时宜：当时运动搞得轰

轰烈烈，人们恨不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就越能表现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普遍地是越来越左，我不能顶着大趋势去把陆平等放出来啊。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李讷代表毛主席来了解情况，我自然而然地要请示对于陆平等人的处理意见，要是毛主席对这件事有个明确态度，是关还是放，我就有了行动的依据了。

我和李讷正在谈话时，发生了砸校刊的事件。（据《北京大学大事记》记载，成立不久的《新北大》校刊，因为刊登聂元梓的一篇纪念“七人大字报”五周月的讲话，被与校文革和聂元梓对立的学生组织砸抄——笔者。）李讷到窗前观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我们要抓人。）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等人原来都在旁边办公室等着，想听听李讷对我说了些什么新情况、新指示呢，因为校刊被砸，有人来告诉这个情况，李讷说要去看看现场，谈话也就结束了。孙蓬一、姜同光等人问我她谈了些什么，我说是毛主席让她来的。我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请示了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我没有详细对他们说什么，因为李讷对学校的运动也确实没有什么具体指示。

李讷第二次到北大来，是11月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校文革办公室找我的。李仲钦告诉我李讷来了，我迎接了她（办公室其他人也看到了）。李讷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

这时候，我住在北大的三公寓。回到我家后，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到上海我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回京后我向李讷汇报时她批评我：“你们为什么叫‘捍卫团’？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路线应该叫‘宣传团’。”——北京西城区有个“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是保守组织。）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我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主席就是说，让你串连去。她还说，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也不行。意思是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她的话当时是怎么具体说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记忆是：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些什么，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李讷说这些话没有说明是主席的意思，还是她自己说的，但使我领会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主席的精神。

李讷讲了以上的话，又说：主席还叫我问问你，关于你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他为你说几句话，保你一下？我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的指示都是关于北大运动和成立校文革的问题，没有什么错误。谢谢主席！现在不需要主席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李讷笑了：你真爽快！

临走时，李讷对我说：到上海要带谁去，你们自己考虑吧。希望你们作出成绩。

◇ 李讷为什么出尔反尔

李讷走后，我很高兴，认为这是毛主席给予我的重要任务，也是对我的信任。为什么毛主席对请示的问题和北大运动没有指示，相反地，对我顺便提到的一个问题特意让李讷立即转告了要我到上海去串连的指示呢？我进一步思考领会毛主席特派李讷来找我谈话的目的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并决定立即执行。

当天晚上，我先对孙蓬一等人谈了李讷和我谈话的精神（因为李讷是找我密谈的，我不能

全部按照原话传达给校文革的副主任和常委)，说了毛主席认为上海和外地运动发动得不够好，同意我去上海串连，还希望我多走几个地方，以及北大运动要等一等全国形势发展的精神。我还讲了李讷说的，去上海串连要宣传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并且可以带几个人同去，要我们自己商量决定。经我们共同考虑后，于第二天上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讲了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讨论怎样执行，谁同我去上海串连，谁留校主持工作？大家都是作为党交给的任务来执行的。如果不是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并且是常委亲自看到了李讷两次来找我），校文革常委也不会同意作为第一把手的我去上海串连的，更不会同意孙蓬一第一副主任也同我一块儿去。我要把学校的工作交给姜同光主持，没有上述理由，姜同光也不会接受的。从我们组成的人员来说，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特意让李醒尘参加。因为他是七人大字报作者之一。

当时我和校文革常委们的思想都认为是执行毛主席亲自交给的发动群众的任务，把上海的运动搞好，目的是反修防修。当时大家都清楚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毛主席自己还在天安门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群众。只要说是哪里的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好，自然就想到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说的，……五十多天来，不执行中央指示，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以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等。我（们）根本没有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目的，一心想的是很好地完成党、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把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对北大和我个人来说，对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还有感激的思想和特别热情完成任务的心情。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极高的“荣誉”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也是现在回忆当时那种状况可以想象得到的！

后来我被逮捕，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审问我的时候，审问人员说，李讷否定了我的这个说法，否定了毛主席指示我到上海串连的事情。这并不奇怪。毛主席对个人或向全国人民讲过话，不也是常有否定、推翻的吗？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对任何人都一样。事实是客观存在，已经刻印在历史上了，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李讷以为，两个人的谈话，没有旁证，是可以否认的，但是，她不知道，还会有许多别的证据。因为执行毛主席指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单独地完成的。我纵有千百条错误，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至于、也没有必要、更不敢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更何况，事件的前前后后，有那么多人可以作为见证呢。

我听了李讷的传达以后，就对校文革的同志，对孙蓬一等人讲了。而且他们都知道李讷来找我，都在五院校文革组织组的旁边的房间里等着听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呢。我把与李讷的谈话都跟他们说了。后来，我被捕以后，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监狱预审时说的内容，任何一件事情，预审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否定过，只有这一件事情，只说李讷否定了这件事。但他们并没有说出李讷所讲的任何内容。我问预审员，李讷否定了上述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她来北大找我干什么呢？为什么连着两次来找我？她没有向我讲毛主席的指示，她来讲了些什么呢？预审员既讲不出李讷在否定毛主席要我到上海串连的指示时，所讲述的有关情况，也没有说明李讷到北大来找我是什么为来，又举不出任何旁证足以证实毛主席没有说过要我到上海。这只能说明，预审员所说，也只是李讷否定了，而不是预审人员对这事的否定。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敢造毛主席的谣的，更不敢在中央文革的要员王力、关锋、王广宇面前造毛主席的谣（详情见下文）。我如果造毛主席的谣被戳穿，我还能受得了吗？

我还可以反问李讷，你否定了你转达毛主席要我到上海串连的指示，那你第二次到北大找我是干什么来了？你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什么指示？难道你一次再次地到北大来，就是为了和我拉家常来了？李讷这么否定毛主席对我的指示是愚蠢的，一句空话就能够否定、推翻当年有十多个人都知道和参与的这件事吗？毛主席指示我去上海串连的意图，是和“5.16通知”的精神相一致的，和他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宗旨相一致的。他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一

个人，他是把一大批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都作为刘少奇的势力，为此而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倒他们的。所以，他称之为“炮打司令部”，在他眼中，刘少奇显然不是一个“光杆司令”。毛主席的大字报说了，从中央到地方，在50多天里，不执行他自己的指示，而是听刘少奇的，压制群众运动，制造白色恐怖，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这难道刘少奇一个人就能办到的吗？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就是要发动群众起来，李讷为了迎合对我的判决，——判决中指责我到上海串连是奉了江青的指令，为了实现江青等人篡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权力的阴谋，去搞乱上海，乱中夺权——而否定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李讷再否定，否定不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否定不了毛主席的这一错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否定不了毛主席在上海“一月风暴”中对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支持和对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被夺权的肯定，更不能因为她的否定就改变我去到上海串连的根本性质，把我遵照毛主席指示到上海去串连说成是执行江青集团的阴谋诡计。因此，李讷的否定，只能暴露她自己是愚蠢的。中级法院根据李讷单方面的陈述，从预审到开庭，从来没有给我看过李讷的文字材料，也没有让李讷与我在法庭上当面对证，就根据李讷所说的一句空话，把我到上海串连算作我的一大罪状，是根本违反事实真相，根本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说我到上海串连“有罪”，那么，“罪魁祸首”、我的幕后指挥者只能是毛泽东，因为，是他通过李讷指示我到上海去的！

◇ 江青的“紧急指示”

就在我们准备到上海去串连的这个期间，11月14日晚，9点多钟，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说：首长江青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个地方去。王广宇说，我们的车子不好直接到北大去接你，你让学校的车送你到钓鱼台门口，我去接你。我问为什么？王广宇说，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王广宇说，不知道。首长没有说。当时我就很奇怪，怎么谈一次话，搞得这么神秘？怎么说为了我的安全，难道出了什么情况？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就说我不去。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没有必要去。王广宇说，接你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坚持不去，因为王广宇没有说接我出来住的原因。在电话上争执了很久，王广宇最后带强制性地对我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也需要安排，否则他们找不到我，还以为我突然失踪了。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下午接我。

但他又不叫学校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了，叫我约定到城里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去等他，然后他再接我走，叫我说一个地方。我曾说：要到什么地方让学校的车送去好了。王广宇说，学校的车不能送我去。他让我指定一个彼此都认识的人，到那个人家里去接头。我想，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一些办公、休息的地方对外是不公开的，不便于直接出入。这样，我同意了他的安排，提了他也认识的阮铭家里（中宣部后院）。王广宇说，那你就按约定时间在阮铭家里等候，我们的汽车到了，不进他家，就按几声喇叭，你听到汽车喇叭响就出来。让他这么一安排，这和电影上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一样了。

第二天我先到了阮铭家。当时在阮铭家里还有陆善功和阮若英。我对阮铭讲了毛主席叫我去上海串连的指示，并且动员阮铭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去。拉阮铭去，是想着人多势众，而且我很看重阮铭的才干。经我再三劝说，阮铭才说他当下去不了，随后再去上海吧。他还说，就是要到上海去，我们也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我和阮铭讲这番话，陆善功和阮若英都在场听到了。

这时，王广宇到了。我就出来上了车。在车上，我又对王广宇讲述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连的情况。

这样子，我只只好是把有关的材料都带在身边，跟他们走了。他们把我带到花园村附近的一

个中央文革招待所——当时中央文革搞了很多记者搞动态，这个招待所就是他们这些记者住的。他究竟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我问了几次，王广宇都没有告诉我，当我到记者站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后来，还是问食堂的厨师，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招待所。）

王广宇把我送到招待所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他问我，你都带些什么材料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他关心的不是其它，就是关心我有没有把材料全都带来。我告诉他，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我把材料递给他，他就把这些材料都包起来，用事先准备好的封条封起来，要带走，说是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替我保存起来，我什么时候要用，就随时找他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凶多吉少，这不是变相地没收了我的有关材料吗？但是，我也毫无办法，只能照他说的，把材料交给他。他又安排我住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这一栋楼空空荡荡。楼上，每一个房间都摆着几张床铺，可是，就是没有人住。他告诉我，吃饭在楼对面的食堂，自己去买饭票。不要随便出去，即使是在院子里也不要随便走动，也不要给外面的人打电话。连家里的电话也不要打。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不是什么高级的宾馆饭店，住宿条件不算好，连被褥都是里子面子一样白，而且是自己到大食堂去买饭。我明白了，我是被软禁了，这是让我受审查。

住了一两天，我给王广宇打电话，说我不能在这里住下去，我要走了。他说要请示一下首长。请示的结果，说是同意我离开。这样，江青找我的意图，什么为了我的安全啊，爱护我啊，这一切全都明白了。我心里猜测，江青是怀疑我和王任重的关系，她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带过去，是要通过文字查我和王任重的联系。当时正是王任重出事之后。

上面讲的是到上海之前与江青的纠葛。这件事还与王力、关锋有关。

在到花园村招待所之前，11月14日上午，王力、关锋找我、孙蓬一、李清昆到全国政协礼堂谈过一次话。他们想把张恩慈从中央文革办事组清除出去，让我们北大出面揭发张恩慈，具体的揭发材料则由他们提供。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连，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揭发张恩慈的这个材料我写不了了（后来，是在校的校文革人员写的揭发材料）。我讲这个插曲，不是表白我没有写揭发张恩慈的材料，而是要澄清，毛主席要我到上海串连的事情，在这一场合，我讲给王力、关锋听了。

因此，在为到上海串连做准备期间，我先后对校文革成员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阮铭、王广宇等讲过毛主席指示的情况，这决不是李讷的一句话就能全然否定的。

我住在中央文革招待所，无所事事，心中充满了焦虑。学校的运动，和到上海串连的准备，都令我牵挂。我很想听到让我住进这个招待所的缘由。因此，我就给王广宇打电话，请他把李讷找来玩儿。我想，从李讷口中是否可以打听得到什么有关情况。李讷来了招待所，我就问她，毛主席和江青对北大有什么说法，有什么意见？李讷说，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这些问题。

从李讷那里没有探明虚实，我就再给王广宇打电话，坚决要求离开。王广宇经过请示，同意我离开，也允许我向外面打电话了。

我离开花园村招待所之前，16日晚上，王力来花园村招待所看过我一次。他是来为我住进花园村招待所一事做个了结的，而不是像他后来所言，是指派我到上海去。他明明已经知道我要到上海去，而且即将成行——我在政协礼堂对他讲过了。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而且不止是我一个人去，孙蓬一他们都去，动静很大。——王力对我说，你们是群众团体，你们到上海，不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你到上海串联，主要是你们自己行动，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有事情可以找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姓甄，甄文君。因为你们是群众出去串连，就是找甄文君，也要注意方式。王力指示这些情况，离开花园村以后，我对北大的校文革成员，和一

些比较熟悉的人，都讲了。就是没有讲江青对我进行审查的事情。情况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也说不清楚，我不能对别人说啊。我只是说，是中央首长安排我住在这里，有特殊情况的。

◇ 上海纪行

我到上海去，11月19日到达，12月16日回到北京。1983年，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判我的时候，上海串连成为我的第一大罪状，并且说我是受江青指派到上海去串连的。这真是冤枉！江青跟我到上海串连有什么关系？

在七处监狱中预审我的时候，预审员说，王力写了个材料，说你是接受了江青的指示到上海去的。我要求预审员拿出事实证据。预审员说，你不要以为王力死了，他还活着，写了证明。我说，我怕王力干什么？我一直就是反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和他没有任何牵连。预审员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王力如何讲是江青指示的，江青做指示的内容是什么。预审员没有说出具体事实，也没有给我看王力写的材料。直到开庭宣判时，也没有能够说清楚，江青怎样指示我去上海，江青让我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和证词的时候，也没有宣读王力写的证明材料。因此，这些罪名，完全是强加的，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根据何在，王力说了些什么，他所讲江青对我到上海串连的指示是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到上海，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历史事实与后来对我的判决书对我的诬陷，完全是两样的。

◇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活动，反对上海市长曹获秋，这是错误的，我深刻地检讨错误，并在这里向陈丕显、曹获秋道歉，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宁。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我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我自己的“独创”，这都是当时的大趋势，向当权派开火，炮打司令部，各级司令部都要用炮轰一轰，这是符合当时的“十六条”的。而且，北京到外地串连的师生，在各省市都是这么做的。

我去的时候，毛主席没有指示说明要我去反对曹获秋。可是，我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群众正在炮打曹获秋，说他是走资派，这一点毛主席是清楚的。到上海市一月夺权的时候，毛主席不是也批准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打倒曹获秋的行动了吗？我要是不赞成造反派反对曹获秋，那就不合乎逻辑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干什么来了？那么，我自然而然地就是要支持群众反对曹获秋的。因此，我到了上海，就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炮打陈丕显曹获秋。我参加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批判曹获秋的大会，并且提倡要群众向党中央请求改组上海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是因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党中央改组了吗？我们到上海，没有想到要夺上海市委的权（所谓夺权，是在1967年1月由上海王洪文等首先发起的，在1966年11月，我们怎么会想到要夺权呢？要夺权，我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夺权，为什么后来不但是远远地落在上海的造反派后面，还对夺权采取消极态度呢？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相反地，我们根本没有夺权的野心，在群众大会上也只是提出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熟悉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改组和夺权根本是两回事，改组是由党中央决定的，由新任命的干部接替旧的领导班子）。当然，因为我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我这么一讲，对于上海群众，影响就很大。攻击曹获秋，说曹获秋是走资派，这自然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使他遭受精神的痛苦，这是我应该深刻检查的错误。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本来还要从上海到广州等地去，因为学校文革的事情走不开，就从上海直接回北京了。我在上海期间，先后见到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张春桥对我讲，上海的运动发展不平衡，工人起来了，学校红卫兵则落在后面。他非常称

赞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他说他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顺利地劝阻了在安亭卧轨拦截火车，要到北京去告状的工人们返回上海。他说上海工人很听党的话，觉悟高，顾全大局，都接受了他的劝告，从安亭返回上海了。张春桥说，你们应该向上海的工人学习，要到工厂去看看。还有，上海的运动和北京不一样，上海街头的群众辩论很好，很有特点，你们也可以去听一听，等等。

因此，我后来找了当时担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王洪文和潘国平，跟他们谈过联合起来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对王洪文，就见过一次面，当时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们曾经到上海的工厂参观和串连过，支持他们反对曹荻秋等。这些都是我在上海犯下的严重错误。

◇ 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

我到上海串连，最令我痛悔的，就是参加了对常溪萍的批斗，给常溪萍同志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尽管常溪萍已经因迫害致死30余年，但是，我愿意在这里真诚地表达我对他的深刻的歉意，愿意作出认真的忏悔。

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工作队到北大来，是秉承中央的旨意来的。北京大学是个大风口，人们见多识广，久经动荡，我自己呢，却是从黑龙江来到北大以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张磐石来到北大，和每个系的党总支书记、系主任都谈过话，动员人们，说工作队到北大来，是想把学校的工作搞好，大家对校长、对校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尽量地谈出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只认为他是中央领导，我讲了对于陆平工作上的意见，以为他会转告给陆平，让陆平改进工作的。谁会想到，他把在北大调查的情况，加上他的认识，上纲上线，写了个报告，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我的话，证明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问题很严重，并且提出要在北大搞社教运动。中宣部长陆定一批示同意，又报党中央，经邓小平总书记批准。

其实，这和当年的反右一样，也是高层领导出面，动员给上级党委提意见。建国以后的每次运动，似乎都是这样开始的。我自己呢，因为在很小的年纪就参加革命，一直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尽管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毕竟年龄小，思想单纯，对于党内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和体验不足，对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领悟较少，在许多时候，都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党的事业的。这从前面所讲，我在安子文问题上主动采取的向党组织汇报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贯如此。

回想起来，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是两头不沾边，——我当时是在哈尔滨市委工作，人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既没有参加哈尔滨市的帮助党整风，给各级领导和党委提意见，又没有参加人民大学的大鸣大放。否则，以我这种单纯、直率的性格，准会把平日里积累起来的对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各种看法和意见一下子倒出来，那还不是划右派一划一个准？我准是个大右派。记得当时，是人民大学的萧前教授辅导我学哲学，他给我上辅导课，关于反右派的事情，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

这样，我对反右派斗争就没有多少亲身经历，没有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以致于这一次，张磐石带领工作队到北大来，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我就上当了，被利用了。我相信了他的话，讲了真话，可是我给陆平提的都是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张磐石就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把北大当作是“烂掉了”的单位，把北大校园里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得非常严重。常溪萍对他的批评就是，第一，张磐石搞家长制，没有民主作风；第二，张磐石太左了，把北大看得问题严重得很。常溪萍的批评，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常溪萍的这些正确认识。他们在工作队领导内部争论，我们在下边的小干部并不知情。

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的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当时，张磐石是工作队的党委书记兼队长。他们带领工作队进校以后，就发动我们批判陆平和北大校党委，作为张磐石助手的常溪萍也动员过学校的干部和教师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后来，常溪萍和张磐石产生了分歧（工作队内部的情况我们当时并不清楚），他认为是张磐石家长制作风，不民主，把运动搞偏了，把陆平等人整过头了，就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谈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邓小平等人的重视。后来就把张磐石撤掉，把工作队撤走了。

因此，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的转折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由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汇报他对工作队在北大搞社教运动发生偏差的批评意见，所以，北大的社教运动发生转折，张磐石被撤离北大。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常溪萍写信的具体内容，只是知道他写信告了张磐石的状，知道学校的社教运动要停下来，工作队要撤离北大，我们这些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们要挨批挨整了。

常溪萍一进校，本来是和张磐石的立场相一致的，他同样出面动员过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现在常溪萍改变了立场，我们就认为常溪萍是“叛徒”，“出卖”了工作队和北大的社教运动。因此，“文革”初期，在批判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同时，人们自然地会想到当年的常溪萍，认为常溪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是社教运动的“叛徒”。——常溪萍在工作队撤离北大时，还向有关方面提出，不要批前一阶段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不要整那些被动员起来给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同志。这话说得非常有理，可是，彭真根本不接受，彭真说，“积极分子批不得，为什么批不得？打击都打击得。”可惜常溪萍的这些意见，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事后很久才听说，才明白常溪萍同志的政策水平和一片苦心。

因此，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批判陆平的同时，就想到了常溪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开全校大会，参加中央全会的各大区和省市领导人，华东局的陈丕显，西南局的李井泉，等等，都到北大来，“学习”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事先，北大有人给常溪萍写了一份大字报，这我是不知道的。在召开大会的时候，他们把大字报交给我，要求我把大字报转交给江青。在会场上，我就把这张大字报转交江青。江青又把大字报交给陈丕显，要他带回上海贴出来。

文化大革命初起，北大的学生就起来反常溪萍，并且很快地和华东师范大学反常溪萍的学生造反派联系上了（常溪萍兼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我呢，反对陆平，批判陆平，自然也是反常溪萍的。我到上海串连的时候，也是和华师大的学生联系的，就住在华师大。我们和华东师大的学生联合开会，批斗常溪萍，我在批斗大会上发了言。师大的学生说他是走资派，我批判常溪萍则主要是讲北大社教运动的情况，说他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这和从历史上讲向国民党当局叛变投降是两回事，因此，说我们诬蔑常溪萍是“叛徒”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我的发言，以及对常溪萍的态度，都是非常错误的，给常溪萍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常溪萍的死亡，是在1967年，是因为张春桥迫害他而致死，这个责任不应由我承担。后来听到别人说，常溪萍在工作队撤离北大的时候，曾经提出，不要因为社教运动的转折而批判前一阶段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常溪萍批评张磐石的两条意见都是对的，他要求保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想到这一点，我内心的负疚感就更沉重了。由于我的幼稚，我的错误，给常溪萍同志造成的伤害，让我抱憾终身。我愿意在这里再次对常溪萍表示我的歉意，愿他的灵魂安息。

◇ 江青的指责

我回北京以后，见到了王力。

这是从上海回来两三天的事。因为我到上海以前，王力跟我见过面，现在从上海回来了，也应该向王力汇报汇报。当时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就找了他，向他汇报了上海串连的情况。他没有具体说什么，只说你们到上海还是进行了许多宣传活动的，等等。汇报完毕，我就回学校了。

同样地，在北京，我也向李讷汇报了上海之行，她批评我们说，你们到上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团”，而是叫“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当时，北京市西城区有一个具有“保守”倾向的群众组织叫作“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李讷批评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也叫“捍卫团”，容易与保守派混淆起来。

这段时间，我还见过江青一次，并且受到她的严厉指责。

这是在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红卫兵的头头的时候，开会以前，她先找了我，把我找到另一个房子里。江青批评我说，你们到上海去串联，为什么说中央文革指使的？我说，我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是毛主席派我们到上海，我们有什么必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呢？

不过，上海有些不知内情却又非常有判断力的人，的确是以为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遣的。陈丕显就这样看。那时候，上海的运动还没有波及到陈丕显。我在上海见到了他，我和孙蓬一找陈丕显谈过一次话，陈丕显就问，你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吧？我坚决否认，我们是群众嘛，没有什么人派我们来，我们自己要来——我们心里是理直气壮，是毛主席派我们到上海，但是，李讷既然没有说明，我们也不能公开张扬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陈丕显看得很明白，他说，你是接受了指示来的。不过，他不知道我是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才到上海的，他也不会这样想，他以为我是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指示，到上海造反来的。这大约也是后来为什么指责我说我到上海煽风点火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不是江青指示来上海的。是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我去了，自然而然地要对当地的运动形势表个态吧。后来判刑的时候，就在这些问题上抓我的把柄。

第十三章 夺权与分裂

◇ 军训和题词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1966年的12月份，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要求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一律回本校，复课闹革命。为此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并且决定要派解放军到学校，帮助搞军训。

我从上海串连回来以后，就在1966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中央文革召开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号召学生都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接受军训。我在这个会议上第一个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搞军训。北大来的是63军，受到热烈欢迎。

这时候，各校的师生都在外面跑野了，要想马上收回来，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北大回来的学生最多最齐，回校的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别的学校都没有回来多少。当时就有人讲，到底是北大，搞得好，把学生都叫回来了。

照我的想法，运动应该告一段落了。当时，如果没有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就要进入后期，揭发批判，问题都差不多了，应该坐下来，研究一下运动以来揭发出来的各种问题，看看哪些是确有其事，需要进行整改的，哪些属于捕风捉影，无稽之谈的；总之，是需

要具体落实一些措施和政策的时候了。

派到北大来搞军训的63军很快就进校了。军队和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哪个部队到北大来，彼此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北大的师生都非常欢迎解放军。我自己当年就是从太南游击队里走出来的，曾经是一名军人啊。

63军在学校期间，1967年2月，他们帮助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不是我聂元梓要拉一派势力而成立的。不是我聂元梓组织自己的一派。在这以前，北大有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军训中为了加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在这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了几个小的红卫兵组织，63军在军训期间，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把这几个小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贯统一的群众组织，取名为新北大公社。因为主要是学生群众组织，也有教员和干部参加，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的成立，还报了中央文革批准。

这里要讲一讲“新北大”一词的由来。这是毛主席在1966年8月17日给北大校刊题的词。在陆平等人倒台以后，北大把自己称作“新北大”，就像彭真倒台以后李雪峰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委称作新市委一样。当时是校刊的人对我说，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请毛主席给咱们的校刊题个字。我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应了。主席第一次题的字送来了，他还嫌没写好，又派人送来第二个题字。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给我，大意如下：“聂元梓同志：上次送来校刊的题字写的不够好，现再送来一个，如不好，仍可再写”。这在当时都向全校公布了。毛主席的手迹很快就被中央档案馆给要去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底稿，也是被中央档案馆要走了）。真可惜，我当时没有复印一份，留个底稿，现在全凭个人回忆，难以准确了。因此，新北大公社的命名，是根据毛主席的题词而定的。

◇ 只联合，不夺权

一过新年，形势大变，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参与下，上海的造反派第一个起来，夺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并且以此影响了全中国。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夺权之风吹向全国，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夺权的势头越来越大，不参加夺权也不行啊。

67年1月夺权的时候，在北大搞军训的63军部队和学生一块儿出去夺。中央号召夺权，号召军队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夺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夺，可是毛主席号召夺权，中央号召夺权，学生们到处跑着夺权，瞎跑了几夭，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跑去以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去干什么？学生还能取代华北局？可是不行动也不行，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夺权号召啊。开始几天，我也跟着学生一块跑了几个单位，如华北局、中央组织部等，瞎跑了几夭，不知道怎么样夺权。后来，我先冷静下来，我理解，党中央的精神是说大联合然后才能大夺权。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中央的文件和报纸上也是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联合大夺权，我必须响应和紧跟啊。我就到地院去找王大宾，正好蒯大富也在这里，还有其它学校和单位的人也在这里，大家就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夺权。当时，上海夺权以后成立的机构，不是叫上海市革委会，而是叫作“上海公社”，后来才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全名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做准备。说着说着，他们就都跑了，他们都不理睬我，就剩下我自己了。在地质学院落空了，我就到清华大学去找蒯大富，蒯大富正在主持开会，在蒯大富那里开会，计划联合的有工厂、机关、学校。我来了，大家都欢迎我，愿意和北大一起联合夺权，但是会正在开，蒯大富又跑了。他不辞而别，把我们甩在清华大学，自己跑到市委那里夺权去了。当时的夺权，好像是谁跑得快，谁先到，先把公章抢到手，夺权就是谁的了，所以蒯大富他们自己跑掉，就不会告诉我们的了。

当时，人们对于夺权的理解，就是以为夺权就是夺大印夺公章。把一个机关的印章拿到手里，这就是夺权了。但拿到手以后怎么办？事先没有想，但是觉得被夺权的单位领导人就是走资派，反正夺了权，把大印拿在手里也没有想交给谁。反正不能叫坏人掌权，可是好人是谁？叫谁来掌权？事先一点儿想法也没有，更没有一个计划。就是领着学生瞎跑，还要跑得越快越好，哪个学校的学生先跑到那个单位了，先入为主，就算人家是头了。但是，就是这个学校是头，也不一定就是他掌权。几个年轻学生，他掌得了这么重要的权力吗？

蒯大富跑掉了，这样一来，我们也不好清华呆着了，蒯大富都跑了，我们还呆在清华干什么？我们已经联络起来的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决定在广电部大楼里设了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电部大楼在西长安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地处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工厂、机关、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有，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是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先联合起来吧，至于怎么夺权，我们都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马上去夺权。我们高教部去夺权，就是听了周总理的话去的。是我当时的一个既定想法，夺权要听中央的。当下就成立了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我说大家先登记一下，各组织要参加大联合的都把单位、电话、联系人登记下来，都回去等着，要中央有了指示，我们就立刻通知你们，立刻就叫你们来，就去夺权。几个造反派组织都是敲锣打鼓地来，来了就算参加大联合了，登记完毕，又喜气洋洋地回去了。表面上看，我们有多少个组织，我们有多少人，搞得声势很大，实际上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也就没有犯大的错误。

虽然说，文革发动起来不过半年时间，但我对于当下的夺权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已经从最初的坚信不移步步紧跟，向着独立思考、冷静分析转变了。我毕竟比那些单纯的大中学生、来自社会基层的工人农民们多一些工作经历，对于党政机关和各部门的情况了解多一些，对于政策性的问题也思索得多一些。我想，党中央规定的“十六条”里明明白白地讲，党的各级干部分为四种情况，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把这最后一类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现在号召夺权，也是号召向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走资派”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具体而言，应该向哪些人夺权？当然应该是向走资派夺权，总不能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的权力都夺过来吧？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何况，即使是走资派，也还有可以改悔的，不能够一概都打倒。我自己也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对于干部队伍，自认为是比较了解的。这样，在如何夺权的问题上，我就有自己的考虑。这也影响到北大的学生，对夺权运动参加得比较少。

但是，在全国上下的轰轰烈烈的夺权风暴中，我的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公开地讲出来的；不执行毛主席联合起来夺权的号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把毛主席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夺权的指示，为了慎重，故意作为是两个阶段，第一步是要做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把联合夺权的口号喊得很响亮，行动却停止在联合上，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怎么样夺权，向谁夺权，我都坚持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等待中央有了明确指示再去夺权。

这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造反派头头，都非常活跃。蒯大富、韩爱晶都到市里去夺权，谭厚兰和王大宾也都有各自的一个摊子。蒯大富跑到市委夺了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派人到广电部叫我去参加。是造反派，我不去不好就跟去了。蒯大富说，我们要夺权，你参加我们的夺权委员会吧。我说行啊，我回学校，跟我们的学生说一说，你等我的回话吧。结果是回去就没话了有下文？

在那种形势下，夺权的行动，口头上我不能说不参加，但是我心里明白，我绝对不参加。我到了市委，看到那里的情况，更觉得不能参加。参加夺权的组织和人都很多，乱七八糟的，

把市委的办公室造得一塌糊涂。这叫谁掌权呀？这些人也能掌权呀？还有，夺权的人们把新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刘建勋等都关起来了。我想，你们把他们关起来做什么？你们不是背上包袱了吗？关起来容易，你们怎么放呀？（我们北大校文革对被工作组关起来的陆平等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如何管理，觉得是个沉重包袱呢！）你们要是把旧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关起来，还说得过去，毛主席给他们定了案了。吴德、丁国钰、刘建勋都是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倒台后新调来的，刚刚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犯错误也来不及犯大错误，他们能有什么大事？他们有什么大问题？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叛徒、反革命，要是说，他们原先所在的单位，出面揪斗他们，如河南之于刘建勋，吉林之于吴德，那还说得过去，北京的造反派能抓住他们什么致命弱点、要害问题？难道说，所有的老干部，统统都烂掉了，一个都不能要了？我在现场看了一下，那种乱哄哄的局面，更使我坚定决心了。我不能跟你们一起，你们掌不了权啊。

我的想法，跟谁也没有说，我做的就是搞大联合，把群众组织都联系到一起，等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说怎么夺权，就怎么夺权，他们说夺谁的权，就夺谁的权。反正，我的行动就是听毛主席指示，搞大联合，把联合起来夺权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却没有具体的举动。我知道哪个单位的走资派是改不了的，该到哪里去夺权？还有，夺了权让谁来掌权？就交给那些学生呀？学生就能掌权？我就能掌权？北大的事情我都被搞得焦头烂额，我管得了那么多呀？

◇ 高教部夺权起风波

坚持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夺权，北大在校外就是实实在在地参加了一次夺权，到高教部去了，这还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按照系统夺权，学校就在教育口夺权去的。周总理有一个指示，他说，学生不要夺党政机关的权，夺权要在本系统夺权。周总理还说，别的学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的学生也应该去啊。北大学生就跑到高教部去夺权。北大到高教部去，搞军训的63军部队也参加了。我并没有跟着学生，我没有到高教部去。

去了高教部以后，学生们就到处找公章，北大毕业刚刚留校的赵某某说是拿上大印了，就算夺了权，但也还不知道、没有计划让谁掌权。下一步怎么办，心中一点儿底都没有。到了高教部才知道，北师大呀，地质学院呀，许多高校的学生都跑去了，都跑到高教部来夺权，都是要在教育系统夺权。赶来夺权的人一多，自然就乱了。人多嘴杂，意见没有办法统一。

在高教部夺权中，矛盾集中在应该由谁来掌权，集中在关于卢正义的评价上。王、关、戚和受他们影响的学生组织，支持高教部的一个干部叫卢正义的出来掌权，北大学生认为卢正义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反对他。为此，两边争执不下。

这时候就发现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了。应该怎么夺权，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应该让坏人掌权。高教部有个一般干部，叫卢正义，对待这个人，群众中间是有争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要支持高教部由卢正义掌权，还有林杰、吴传启等都是支持卢正义的。张春桥也出面证明说，他和卢正义在国民党监狱里坐牢，是同敌人共同进行斗争的，因此，张春桥最了解卢正义不是叛徒，是个好同志。北师大群众组织“井冈山”，和它的头头谭厚兰，跟着中央文革的指挥棒，都是支持卢正义掌权的。但是北大的学生就发现卢正义历史有问题，据有关材料说明他是叛徒——关于卢正义的问题，不是我经手搞的，是学生们搞出来，汇报上来的。北大的学生就反对卢正义，不同意让卢正义在高教部掌权。这本来是需要继续调查情况的。至少，在历史真相澄清之前，是不应该匆忙地把卢正义扶持上台的。我们就进行一些口头调查，并且揭露卢正义的叛徒身份。

因此，围绕高教部由谁来掌权的问题，参加高教部夺权的各高校学生发生了争执。我们是坚决反对分裂群众的，只要把卢正义的问题查清楚，群众的意见，谁是谁非，马上就明白了，

意见也就统一了。可是，不等我们把问题查到底，这时候，中央文革的人就出面干预，把局面搞得更乱，搞得不可收拾了。

北大学生到高教部夺权，本来是根据周总理指示的。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党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强迫北大学生撤离高教部。陈伯达给我打电话，叫我把北大的学生叫回学校，并且要向谭厚兰道歉。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纷纷出面了。王力和关锋也给我打电话施加压力。他们说，本来是想找孙蓬一的，没有找到，那就跟你说吧——你们北大学生要兵分三路，一路冲中央文革，一路冲北京军区，一路冲《红旗》杂志社（当时中央文革决定，要是冲这三个地方，就以反革命论罪）你们为什么要冲？好，你们来吧，我们不怕，我们等着你们呢！我听了电话，感到莫名其妙，北大学生哪里会有这种事情？这纯粹是造谣！可是，他们代表中央文革，他们讲了话，我就得有所反应啊。这些干扰下，就迫使我们放弃对于卢正义的叛徒问题的追查，转而在北大进行内部检查，看是否有与这些“冲击事件”有关的人和事。

与此同时，戚本禹就拉住北师大的谭厚兰，开始拉派了。《红旗》杂志有个林杰，和谭厚兰关系很好；林杰又和戚本禹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社的。这样，戚本禹就鼓动谭厚兰出头反对北大，北大的学生当然不干，就和谭厚兰发生矛盾，互相辩论，互相争执。谭厚兰的后台是戚本禹。戚本禹就造谣说，北大的军训部队和学生一起到高教部冲谭厚兰，解放军搂抱女学生，污辱了女学生，你聂元梓在学校遥控指挥，你聂元梓必须得到高教部给谭厚兰道歉。

当时63军也知道这件事情。我对63军说了来自中央文革的指责，他们在高教部也听说了，63军对这事很重视，把他们的造谣当作是确有其事，非常紧张，有部队官兵搂抱女学生这样的事还了得？63军连夜在内部追查，一个战士一个战士都问过了，在高教部有什么举动，结果没有查出什么上述行为来。63军马上给中央文革写了报告，澄清这件事。

可是戚本禹还不放过我，硬逼着要我到高教部去给谭厚兰道歉。道歉就道歉吧。我算是能够忍耐的。他们还让我把到高教部夺权的北大学生叫走，叫走就叫走，外面的局面难以应付，我们正想回学校去呢。我到了高教部，找不到谭厚兰，她躲着不见我。我就是要向她道歉，她也得露面呀。我等了好久，没有找到谭厚兰，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等下去，我是人到心到了。我和63军的同志一块儿把北大的学生叫回学校。在学校，还在学生中间查了一番，看是否有人混水摸鱼有流氓行为，结果也没有查出来。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

从此以后，我对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有了一些认识。怎么作为中央文革的领导人还说谎话呢？凭空捏造，诬陷学生和解放军，这算什么行为？

而且，从此以后，北京的造反派就分裂了。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就开始搞活动，反对北大，和北师大的谭厚兰一块儿搞。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坚决反对让叛徒卢正义在高教部掌权。这事情是学生先闹起来的，从学生那里发端，我是同意学生的看法。我认为，有必要根据调查的材料弄清楚卢正义的历史，以及他与张春桥的关系。我觉得，不管卢正义是不是叛徒，夺权不能这么夺。到底怎么样夺权，我也说不好，我就认为不能让坏人夺权掌权。这时候，地质学院，北农大，北师大，各个学校加一些学生，反北大的，都是被王关戚挑动学生搞分裂的结果。这时在我的思想里认为，夺权应该是有领导的，由中央说了算，不能每一个单位都夺权，所有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呀？即使是走资派，这里头还有不少是愿意改悔的，不能都成了不肯改悔的，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党中央精神呀！从此我就不叫学生这样到处跑去乱夺权了。

◇ 天派、地派的分裂

北京学生的两派，就是从高教部夺权的分歧开始，被中央文革加以利用搞起来的。要是划分派性，我们北大是反王关戚的，对立的另一派则是紧跟王关戚，就是反北大，他们有中央文革、有江青的支持。

搞派性斗争，北大历来是处于守势，是被迫应战，从来没有主动地出击，没有到外校去搞武斗，都是人家上门来打我们。

1967年的春天，4月11日，他们挑动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着几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挑动武斗。他们坐着汽车，开着高音大喇叭，在北大校园里游行了一圈，呼喊口号：“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是“二月逆流派”，“北大校文革压制真正的造反派”等等。他们的汽车走到南校门，被他们惊动了的北大学生涌出来，把校门关起来，跟他们辩论，事态继续发展，就会形成武斗。他们毕竟是外边来的，比北大的学生人数少很多，要是动了手，他们准会吃亏的。可是，我心里明白，不能让学生打学生，不能在北大发生这样的武斗。我闻讯赶到现场，我对北大的学生说，不要打，不要动手，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我出面给外面来的学生们道歉，并且对他们说，欢迎他们给我和北大校文革提意见，但是不应该用现在这种方法。我要北大的学生打开校门，让外校的学生离开。这样，平息了事端，把外校学生打发回去了。

这次武斗是周景芳安排指挥的。发端仍然是关于卢正义的评价问题。北大学生反对卢正义，说他是叛徒，戚本禹要让他掌权，遭到北大学生反对，而且，从卢正义的历史里发现，他有一段历史不清楚，需要继续调查。这还涉及到张春桥。但是，王关戚等人就硬性地要支持卢正义上台掌权。反对卢正义，主要是学生搞的。我没有更多的行动，我认为学生讲的是事实，有道理，所以我坚决支持学生反卢正义的行动。并且，由此也启发了我更深刻地对王关戚等一帮人的认识。结果卢正义在高教部呆不住了，就到西苑中医院看病住院了。我有一天感冒发烧，也到西苑医院去看病。因为我的体温高，医生就不让我走，在医院住了一夜。有人告诉我说，卢正义就住在这里，在楼上。那以后，卢正义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文革以后也一直没有露过面。我所知，是至今下落不明。

北大反对卢正义，反对林杰，而卢正义、林杰都是受中央文革支持的，地质学院王大宾、师范大学谭厚兰也都是支持卢正义的。为此，北京的大学学生组织分裂了。分裂就分裂，其实也没有分什么派。谁给弄的派？就是中央文革弄的。1967年9月份，揪出王力关锋，就在那个会议上，中央文革和江青给扣上的帽子，她说你这几个学校是“天派”，你这几个学校是“地派”，关于“天派”和“地派”的说法就是由中央文革发明出来的。这样，我和蒯大富、韩爱晶成了“天派”，谭厚兰和王大宾成了“地派”。原先的分歧，本来只是针对一些具体观点，没有明确的派性，没有明确的界限，被中央文革这么一弄，矛盾越闹越大。然后就正式形成完全对立的两大派。而且，一派是保守的，后来分裂出来的另一派是真正的革命派。“五大领袖”（指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的说法也是这次会上宣布出来的。

江青等不但将北京高校的群众组织划分为两大派，而且，他们支持地派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地派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我们新北大公社则处处受到排斥和冷遇。后来，各单位纷纷成立革委会，“地派”那边一个学校一个学校都安排好了，他们懂得抓权啊！他们都让谭厚兰、王大宾当了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天派”掌权的学校就没有成立革委会。清华的蒯大富在政治上比较糊涂，因为他就是一个学生，很年轻，也没有更多的经验。蒯大富反过江青，所以江青就不喜欢他，又没有办法把他弄掉，就把他塞到“天派”里头。还有韩爱晶，根本不是我拉他，是江青他们划拉人马把他和我划拉到这一边来。学生组织之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江青就利用学生的幼稚和单纯搞阴谋诡计。彭总（彭德怀）就是他们授意，让红卫兵从四川抓回来的，就关在北航韩爱晶那里，本来彭总是王大宾从四川三线那里弄来的，交到韩爱晶那里看起来。他们为

什么不把彭总交到北大？他们不敢交，他们知道北大的观点，知道北大是反中央文革的，知道北大成了反对王关戚的据点了。

还有，我从来不接受“五大领袖”的提法，也不接受所谓“天派”、“地派”的划分。所谓“天派”、“地派”是很模糊的。“地派”倒可能是形成了一派，而反对“地派”、与“地派”不一致的，就划到了“天派”里面。其实，北大、清华和北航，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派系，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都没有在一起开过任何“天派”的会议，相反地，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有分歧，意见和行动都不一致的。

“五大领袖”的帽子，当时我就不同意，我不是“领袖”，我不是拉群众拉派性，我就是根据“5.16”通知，根据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指示，参加文化大革命。到了“一月革命”，我就看出了问题。我不是单纯反对卢正义，我是想，这夺权到底应该怎么夺，应该由谁来夺？夺了以后谁来掌权？所谓走资派，都是一些老干部，哪个是肯改悔的，哪个是不肯改悔的，就都统统不要了？他们过去都是有功过劳的，都是有光荣历史的，当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就一个都不要了？都烂掉了？我的观点就是，夺权和掌权都不能不要老干部。《十六条》上还说，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呢。光靠学生能掌得了权？到底叫谁掌权，还得党说了算。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

◇ “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

明明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和王关戚等人在群众组织中大搞派性，制造分裂，但是，他们又借着批派性整我们。我忍无可忍，就回敬他们一下子。

1968年的春天，大约2、3月间，在北大，我找了赵建文，魏杞文几个人，以两个子虚乌有的组织，“独立寒秋”战斗队等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是写给毛主席的。由魏杞文起草，我修改以后发出的。

为什么写这个报告？就是因为江青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煽动派性，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斗争；但是，当我们组织反击、揭露中央文革的丑恶嘴脸的时候，他们却又以批判派性的借口，用批派性的理由整我们。因此，有的时候，我们反对江青的斗争，在他们控制的舆论中，也似乎成了一种派性斗争。我的意思就是要分辨这种情况，我们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不是在搞派性，我们和“地派”的斗争，也是和江青等人的斗争。我们不是反对“地派”的学生群众。“地派”的有些人则是受中央文革指使的，他们搞派性，是在替中央文革排除异己。因此，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表面上看是两派在闹，实际上是有中央文革的手在操纵，我们是在与中央文革那帮人做斗争。当时我就认为，北大分裂出来的那一派，叫“井冈山兵团”的，就是站在江青和中央文革一边的，所以认为他们站错了队。总之，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央文革分裂群众而写的。这个报告没有用我的名义，用的是两个并不存在的战斗队的名义（一个叫“独立寒秋”战斗队，另一个我忘记了，据别人说，是“除隐患战斗队”），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了自我保护，要是我自己出面，那被江青他们追究起来，又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了。就假装是学生们交给我的，要是追查起来，就说那两个战斗队已经解散，那些学生也找不着了。北大上万名学生，我到哪里去找？

这篇报告，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江青等人并不知道。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

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

讲派性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的报告的批示中讲的。但是，毛主席的批示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

这份报告送上去，批回来，我这时还不知道。哈斯为这件事情到学校里来，我正好不在学校。是在外边开会。哈斯找到一个学生，也姓聂，名字记不清了。这份报告是经他的手印刷的。和哈斯一接触，聂很紧张，不知道是吉是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不好了，家里出了事了。”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卫戍区来了人，叫哈斯，他们逼我把报告的底稿找出来交给他。我说这底稿一时半会儿找不见，他们就让我下午找好了给他。”这个学生不知道问题何在，以为要倒霉，就跑掉了。他跑到颐和园躲了起来，不敢回学校去。

这件事有误会。哈斯是卫戍区派去，那时候军人本来就威风，哈斯又说得很严肃，好像是有什麼严重的问题，就把聂给吓坏了。我心里有底，我自己的动机我自己清楚，这个报告我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报告打上去以后发生什么情况，我就知道了。我也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告诉这个姓聂的学生说，你不要怕，不要躲，不会有什么事的，有事也找不到你头上。我就告诉他们，说是报告交到上边了，底稿不要交，就说找不着。

接着，我也想摸一摸中央文革的情况，看看对这个报告有什么反映，我就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说是有紧急的事情，要求江青接见。江青接见我，我就讲了这件事情：本来是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现在卫戍区派人来查，哈斯把学生给吓跑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江青告诉我，这是谢富治派卫戍区的人去要的，（知道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报告）谢富治想看看这份报告，江青也想看看这份报告，所以派卫戍区去要。我就说，你江青、谢富治要看这个报告，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了，派了卫戍区的人去直接找学生，哈斯又那么威风，学生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还不吓坏了？

我和卫戍区，就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后来，江青把这件事栽到傅崇碧身上，作为傅崇碧的罪状之一。反过来，又成为我去搞傅崇碧了，又给我加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具体的过程，我也说不清楚江青搞了些什么名堂。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